

前言

延安是中國的「革命聖地」。中國共產黨正在倡導「紅色旅遊」，宣傳「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延安就是目的地之一，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遊客前來參觀。¹他們在這裏瞻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在抗戰期間住過的窯洞，走進宏偉的延安革命紀念館接受官方版本的根據地歷史教育。曾經的中共陝甘寧邊區覆蓋陝北十八縣、隴東六縣和寧夏一縣，首府就設在延安。從1935年抵達到1948年離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陝北。他們把這裏變成了中國革命的「搖籃」。在延安，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群眾路線、自力更生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給美國貼上了「紙老虎」的標籤。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延安這個大熔爐裏鍛造成型。

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1935年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們不可能想到陝北會有如此輝煌的未來。事實上，他們曾絞盡腦汁，想要

1 “China Boosts ‘Red Tourism’ in Revolutionary Bases,” *China Yearbook, 2003–2004*. <http://www.china.org.cn/english/government/120838.htm> (viewed 2020.4.28).

逃離這個乾旱、貧瘠的落後地區，轉移到更富庶的陝南或華北平原，甚至希望到中蘇邊境去找一塊安身之地。延安以及後來的陝甘寧邊區能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地，完全是個意外。共產黨在陝北的革命史不是一個簡單的故事。我們的敘事要從頭展開，陝北大地幾個世紀以來叛亂頻生，地方社會反覆遭受乾旱、饑荒、移民以及土匪的滋擾。一些心懷理想的年輕知識分子，從生吞活剝的馬列主義思想中看到了希望，走上了革命之路，其間有慘痛的失敗，有錯失的機會，也有代價高昂的勝利。早在1935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之前，在陝北的小山溝裏就已經有所謂的「共匪」在打游擊戰了。本書所書寫的就是他們的革命史。在這齣革命大劇裏，演員紛繁登場、時生齟齬，佈景變幻不斷，也發生了一連串機緣巧合的事件。所發生的一切並非必然，也沒有一條既定的革命道路，不過，何以如此，我們還是能加以解釋。

陝北的革命運動聲勢雖小卻不屈不撓，當其成長之時，在約1,500公里以外的南方，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離開了江西蘇區，開始了那場後來被稱作「長征」的艱苦撤退。途中，毛澤東的部隊減員90%，抵達陝北時，僅剩下七千士兵，而且裝備簡陋。十年過後，抗戰結束，共產黨旗下已有百萬雄兵。毛澤東1948年離開陝北後不過一年有餘，他手下的人民解放軍就在與國民黨蔣介石的內戰中取得勝利，進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抗日戰爭期間，延安成為進步青年的聖地。他們一腔熱血，渴望逃離陳腐、墮落、保守的國民黨政權，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將是一個能夠代表工人、農民和中產階級愛國者利益的新政權。他們投入延安窯洞裏簡樸的集體生活，在抗日軍政大學接受訓練，成為敵後游擊區的合格幹部。在抗大，他們聆聽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普遍萌生了一種新的信念：在延安，他們看到的是孕育未來中國的種子。他們的

想法沒錯。

在江西蘇區的最後幾年，毛澤東的境況頗不如意。他的福星是在長征途中升起的。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在陝北採訪他的時候，毛澤東已經成為世所公認的中共領袖。那些日後將被稱作「毛澤東思想」的文章主要是在延安時期寫的：〈實踐論〉(1937)、〈矛盾論〉(1937)、〈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此外還有文革期間所有中國學生都要背誦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1944)、〈紀念白求恩〉(1939)、〈愚公移山〉(1945)。²抗日戰爭快結束時，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思想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延安標示着中國歷史上毛澤東時代真正的開端。

關於延安時期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早的英文著作聚焦於毛澤東在延安撰寫的一批影響深遠的文章。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終其一生，細緻入微地挖掘毛著述的原始版本，並探討了其中「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問題。³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毛如何樹立起自己的理論權威，以抵銷王明的影響力。這位1937年才從莫斯科歸來的書呆子氣十足的年輕人是當時毛最重要的對手。此後其他學者的研究加深了我們對毛澤東著作的「師承」及理論班底的理解：毛的很多理論出自對斯大林論述靈活而大膽的借用。⁴我

2 官方英文版見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1); 原文譯本見 Stuart R. Schram et al.,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7 vols. (Armonk: M.E. Sharpe, 1992-).

3 Stuart R. Schram,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o Tse-tung*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7).

4 Raymond Finlay Wylie,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shua A. Fogel, *Ai Ssu-c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1987).

們已逐漸認識到，儘管毛在內心深處是民族主義者，但他仍然把中國共產黨視作共產國際的一個分支。關於中共和蘇共之間長期而複雜的合作/衝突這一主題，已經有很多出色的研究，以細緻和高明著稱的中國歷史學家楊奎松的貢獻尤其值得注意。⁵

後來者研究陝甘寧邊區，都繞不開馬克·塞爾登 (Mark Selden) 的開創之作《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塞爾登對陝甘寧邊區的「群眾路線及平等主義價值觀」(popular participation and egalitarian values) 進行了充滿同情的描述，並將其定性為「人類自由與發展的願景」(vision of liberation and human possibility)，儘管這一觀點遭到很多人批評，但對於陝甘寧邊區的研究，塞爾登的著作仍不失啟發意義。關於陝北革命運動如何從當地的「土匪亞文化」脫胎而出，塞爾登給出了最好的敘事。根據他的描述，土地革命為一種新的秩序創造了前提，令當地幹部投身於斯巴達式的生活與革命事業。他還分析了新政權如何通過選舉、動員群眾墾荒、思想改造等手段推行一系列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塞爾登後來也承認，他的一些看法，尤其是關於整風運動的，太過樂觀；不過他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要觀點。⁶

5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相關英文著作參見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2); Michael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較早，說服力略遜一籌。

6 Mark Selden, *The Ya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a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M.E. Sharpe, 1995), 引文來自 1971 年版 p. vii。塞爾登的一批文章對陝甘寧邊區的起源也有很好的梳理，不過限於 1960 年代能掌握的史料：“The Guerrilla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The Origins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28 (October–December 1966), pp. 63–81; and 29 (January–March 1967), pp. 61–81.

彼得·席蘭(Peter Schran)對陝甘寧經濟發展進行了細緻的研究，支撐、印證了塞爾登關於陝甘寧邊區的積極評價。席蘭認為，陝甘寧的經濟發展「有效滿足了共產主義運動和邊區廣大人口的基本需求」。⁷紀保寧(Pauline B. Keating)也曾對大生產和互助合作運動進行過詳盡的研究，啟發人們注意陝甘寧邊區內社會經濟的地區性多樣化，其間的種種差異在許多重要方面影響了本書的敘述。⁸朱鴻召的著作生動講述了延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時間和金錢，舞會、戀愛、蝨子、大膽的年輕女性和被強迫的政治婚姻，以及政治對日常生活和私人領域的不斷侵佔。⁹

陳永發是一位在美國接受過學術訓練的台灣學者，他關於中共歷史的研究在世界範圍內是數一數二的。陳曾專門就塞爾登的研究提出批評意見。他對邊區的鴉片種植做了深入研究，提出：「沒有鴉片貿易，馬克·塞爾登在陝甘寧邊區發現的經濟增長根本不可能。」¹⁰陳所使用的文獻僅僅提到了「土特產」，但他認為此即鴉片，邊區通過向外界輸出鴉片獲得購買藥品和其他重要物資的現款。陳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也意味着席蘭關於陝甘寧邊區經濟政策的正面評價有待商榷之處。1989年我在陝北搜集檔案、做田野調查的時候，有關鴉片的話題是被絕對禁止

7 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 引文來自 p. ix.

8 Pauline B. Keating, *Two Revolutions: Villag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 1934-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0 Chen Yung-fa, "The Blooming Poppy under the Red Sun: The Yan'an Way and the Opium Trade,"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5), p. 264.

的。不過，罌粟的種植和鴉片出口當時在陝北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一些老農講着講着就不顧地方幹部緊張的眼色，毫不猶豫地承認了。

關於1942至1943年整風運動的一系列研究構成了對塞爾登研究的重要挑戰。毫無疑問，在把全黨團結在毛澤東身後以及用紀律約束異見者方面，整風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塞爾登指出，整風運動的必要性在於，當時中共把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敵後的抗日游擊戰中，需要將黨的紀律與地方能動性結合，但用常規的行政管理手段很難實現。他也提出，從延安到文革，毛依賴政治運動影響社會和政治進程的思路一以貫之，這是毛時代政治的重要特徵。¹¹然而，文革之後，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已非常明顯，由此出現了對整風運動截然不同的分析視角。

在其早年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彼得·希伯爾 (Peter J. Seybolt) 強調，對恐懼有意識的利用可以促進知識分子和下級幹部的思想統一。¹² 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一書直接挑戰了塞爾登關於延安道路玫瑰色的解讀。陳首先注意到整風運動中不同尋常的過頭現象，這場運動從政治學習轉向審幹，最終發展成「搶救失足者」的瘋狂運動，一批忠誠的幹部成為打擊目標。¹³ 中國大陸的高華勾勒了一幅與此相似的圖景，他強調了毛對於整風運動特殊的責任——意在通過這場運動打垮黨內的競爭者，高華還將整風運動與上白蘇區時期、下至文革中共黨內持續不斷的血腥清洗聯繫在一

11 Selden, *Yenan Way*, pp. 188–200; 亦見 Boyd Compton, e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 1942–44*,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ublications on Asi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2), pp. xv–xxxiv.

12 Peter J. Seybolt, “Terror and Conformity: Counterespionage Campaigns, Rectification, and Mass Movements, 1942–43,” *Modern China* 12, no. 1 (January 1986): pp. 39–73.

13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起。¹⁴ 泰維斯 (Frederick C. Teiwes) 在一項重要的研究中，考察了毛時代中國特有的整風運動在延安的起源，以及整風如何在1949年之後變本加厲地成為社會生活的常態。¹⁵ 上述研究均發掘了重要的新材料，揭示了整風運動複雜的政治態勢以及深刻的心理影響，並對我們理解延安在毛時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扮演何種角色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啟示。

因其方法論上的推進和概念之精微，大衛·阿普特 (David E. Apter) 和托尼·賽奇 (Tony Saich) 的著作《毛時代中國的革命話語》最深刻地影響了我們對整風運動的理解。在阿普特和賽奇之前，沒有人接觸過那麼多整風運動的主要發動者和受害者，兩人搜集到的口述材料和賽奇對於中共歷史無與倫比的了解，以及阿普特在概念層面的重要洞見相得益彰。儘管他們的研究偶有史實硬傷、有些言過其實，且過於理論化，但瑕不掩瑜，他們的著作仍雄辯地勾勒出整風運動所塑造的「話語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 和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主流革命敘事」。更重要的是，他們勾勒出「查經式親密化」(exegetical bonding) 所造就的那種近乎宗教的體驗。所謂「查經式親密化」即黨員在經過曠日持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根除過去的私念後，方能作為新人被黨組織重新接納。在這個過程中，阿普特和賽奇一方面注意到整風與宗教裏的查經儀式的類似之處，另一方面也強調蘇共斯大林式的方法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對中

¹⁴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近期推出了英文版：*How the Red Sun Ros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1930–1945*, translated by Stacey Mosher and Guo Jia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9)。

¹⁵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Armonk: M.E. Sharpe, 1993)。

共的重大影響，對此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調整。¹⁶

上述研究無不說明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有着怎樣的深遠意義，它催生了一系列理念、實踐以及模式，形塑整個毛澤東時代並影響着時至今日的黨的政策。當然，如許多學者已經注意到的，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情況極為特殊。陝甘寧邊區是中國西北角一塊偏遠的根據地，遠離日軍封鎖線並得到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默認（不管多不情願），享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黨的權力在這裏完全不受限制，這是所有其他根據地都無法企及的。更重要的是，戰時中共實力的大規模擴張恰恰是在其他敵後根據地實現的。因此，曾有學者提出一個極具說服力的觀點：中共成功真正的決定性因素應該從陝甘寧以外其他根據地尋找。¹⁷

這一觀點不無道理。陝甘寧的經驗與其他敵後根據地的演進確實無法相提並論。對本書將要展開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

16 David E. Apter and Tony Saich,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查經式親密化」一詞譯文蒙托尼·賽奇教授指正，謹此致謝。——譯者註。

17 持此觀點的學術研究難以一一枚舉，但其中最重要的著作無疑包括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Kathleen Hartford and Steven M. Goldstein eds., *Single Sparks: China's Rural Revolutions* (Armonk: M.E. Sharpe, 1989); Saich and Van de Ve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Yung-fa Chen,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Odoric Y. 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regor Benton, *New Fourth Army: Communist Resistance along the Yangtze and the Huai, 1938–194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延安的情況等同於陝甘寧邊區其他地方的情況。延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來者佔據，有隨長征隊伍到來的紅軍老兵，也有以愛國抗日為目的、從沿海大城市投奔此地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然而，如果沒有根據地周邊的拱衛，延安革命將無從談起。延安之所以成為「革命聖地」或者（借用阿普特和賽奇的術語）毛所塑造的「革命擬像」（revolutionary simulacrum），恰恰因為它也是陝甘寧邊區的中心和首府。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建立邊區的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的研究興趣一直聚焦於造反和革命等社會運動。從辛亥革命、義和團，再到對1989年事件的研究；我一直致力於理解導致平素安常守分的人們起而抗議的社會經濟因素，和使得這樣的抗議行動獲得動力乃至成功的政治、軍事格局。¹⁸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裏都忙着維持生計、養家糊口、照顧老人。跟鄰居拌個嘴，跟領導甚至政府官員吵個架也都稀鬆平常，但這樣的糾紛很少會演變成大規模抗議。有些情況下確實會爆發抗議，但鮮少發展到推翻政府的程度。最罕見且因之引發學界強烈關注的，是那些造成社會結構、政治結構根本性變革，由抗議發展而成的革命。我在1960年代步入學界，親歷了美國的反越戰抗議，並受到諸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等比較研究巨著的啟發。¹⁹像我這一代的很多中國學者一樣，我為那場被稱為中國革命的天翻地覆之變因何發生而深深着迷。

18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Joseph W. Esherick and Jeffrey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4 (November 1990), pp. 835-865.

19 Barrington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越戰期間，我們似乎生活在一個由農民重塑世界的時代。從中國到越南，從古巴到尼加拉瓜，農民在抵制帝國主義和階級壓迫上扮演著領導角色。長久以來，農民社會因無可救藥的落後與保守而遭到輕視，現在卻改頭換面為革命的溫床。農民曾被馬克思譏為「一袋馬鈴薯」——拒絕集體行動並常常被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對立面的那些保守分子所利用，現在馬克思的觀點完全被20世紀革命的實踐顛倒過來了。²⁰ 農民革命在學界風靡一時，而中國則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大學講授相關課程時，這方面的比較研究或理論文本讓我兼受啟發和挫敗。在《二十世紀的農民戰爭》一書中，埃里克·沃爾夫 (Eric R. Wolf) 指出了「戰術靈活的農民」的重要作用，而傑弗瑞·佩吉 (Jeffery M. Paige) 則在《農業革命》一書中指出了「佃、僱農制度與共產主義革命之間的普遍聯繫」。²¹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農民的道義經濟》有廣泛的影響力，不過他關於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瓦解了農村道義經濟一說似乎並不能解釋內陸地區的共產主義革命。²² 塞繆爾·波普金 (Samuel L. Popkin) 的

20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3), pp. 124–125.

21 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Jeffery M. Paige,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引自 p. 63. 「戰術靈活的農民」(tactically mobile peasantry)，由擁有土地、自給自足的「中產農民」，及身處地主控制地區之外的「邊緣」農民組成，他們被視為「擁有某些內在優勢」和面對大土地主時「微弱的戰術自由」。「沃爾夫視之為革命的主要承擔者，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造成的變化最為敏感，而他們最倚賴的親緣及村莊關係正是在上述變化中遭到破壞。」參考：Eric R. Wolf,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91; Jeffery M. Paige, “Social Theor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Vietnam and Guatemala,” *Theory and Society* 12 (1983), pp. 699–737. ——譯者註。

22 James C. Scott,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理性的小農》一書挑戰了斯科特的理論，用「政治企業家」這一範疇來強調地方幹部的作用，不過很少有亞洲學者認為可以將其理性選擇理論 (rational choice theory) 套用到本地區農民的行為模式上。²³

當歐美學者致力於比較研究的時候，中國學者則以「農民戰爭」為題寫出了大批論著。「農民戰爭」這個詞顯然來自恩格斯關於德國農民戰爭的著作。他們認為，中國歷朝歷代的農民造反是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先聲。²⁴ 歐美的中國學者往往發現，他們所做的案例研究與中國的學術成果和既有的理論框架都不相容。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書中，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發現淮北的捻軍起義和共產革命之間並無連續性，相反卻有着明顯的斷裂。²⁵ 畢仰高 (Lucien Bianco) 一生研究中國農民的抗議行動，他的結論是農民造反很少出於地主對佃農的壓迫，更多是對抗官府的徵收無度。²⁶

23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政治企業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指的是「願意投入自己的時間和資源，協調其他人的投入，以推動集體行為或生產集體商品」的人，波普金特別指出：「當一位農民在計算個人的成本和收益、投入和預期產出之時，會對他要聽命的組織者——『政治企業家』的信譽和能力做出主觀估計……農民的這種主觀估計將直接影響到該『企業家』組織農民的能力。」 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p. 259. ——譯者註。

24 See Frederic Wakeman,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The Study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2 (1977), pp. 201–237.

25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6 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M.E. Sharpe, 2001); Lucien Bianco with Hua Chang-ming, *Wretched Rebels: Rural Disturbances on the E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rans. Philip Lid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關於中共革命的研究揭示，各地起作用的社會條件和政治態勢千差萬別，很少能與現存的理論框架和比較研究完全吻合。²⁷

在對農民社會及集體行動的興趣之外，本書的學術宗旨也受到另一種研究取向的影響。我合編過一本《中國地方精英與支配模式》，²⁸ 中國大一統政治體制之下的地方社會結構之多元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理解政治一統與社會多樣性相互作用的多種方式，我開始研究地方史，而我所關注的區域也不斷變化。做辛亥革命研究時，我關注的是湖南和湖北；研究義和團時，我的目光轉向了華北平原；現在因研究中共革命，又轉向了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很多學者自始至終在某一熟悉的地區耕耘，研究越來越精深，而我則深恐自我重複和收益遞減，所以不斷轉向新的地區。

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我也覺得有必要集中視野，試着做一些我最欽佩也最感興趣的微觀社會史研究。《改良與革命》比較了軍人在湖北領導的辛亥革命和士紳在湖南領導的改良。在《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中，我的視域從省進而聚焦於縣，由此發現了孕育大刀會的魯西南與孕育義和拳的魯西北之間的迥然不同。²⁹ 寫作義和團那本書的時候，恰逢中美兩國重啟外交和文化上的往來，我因此得以到當年出現過義和團的村莊裏去做田野調查。儘管這項

27 Stephen C. Averill, *Revolution in the Highlands: China's Jinggangshan Base Are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Fernando Galbiati,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Roy Hofheinz,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及註釋19所引文獻。

28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9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調查為時不長，中國鄉村的多樣性仍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因此我一開始研究陝北，就把重點放到了村一級。我在中共1940年代曾經調查過的那些村莊展開田野調查，從這些村子所屬各縣的檔案館搜集了檔案和史料。

我曾就陝北農村調查寫過幾篇論文，其中，我試圖理解共產革命過程中的鄉村社會變遷。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是共產黨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但是這樣的結論過於簡單化，無助於理解由多種社會背景、個人利益與政治意圖組成的政黨如何形成了有力的軍政團體。儘管黨員大多來自農村，但中共並不是一個農民黨，也不是一個按自己的意志改造農村社會的外來軍政實體。村一級、區一級、縣一級和中央一級的黨組織在關切點、利益訴求和革命志向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不同。因此在實際工作中，黨需要創造出一種在某種意義上能使各級黨組織協調一致的綱領性語言。向村幹部解釋教條主義的危害沒甚麼實際意義，不如鼓勵他們要靈活執行上級指派的任務。在研究和撰寫這幾篇文章的過程中，我提出了「黨的人類學」，以了解黨是如何在不同層面上協調運作的。³⁰

這為我帶來了一個無解的兩難問題。農村調查顯示，上級黨組織發現了農村幹部中的一些問題，我也多多少少找到了一些中共當時出台的旨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比如加強對黨的歷史和政策的學習；批評那些家庭觀念過重的幹部；把參加過哥老會，對革命不那麼忠誠的幹部清洗出去等。但我沒有發現促使中共中央制定這些新政策的爭議，也沒有發現上級要求中層黨組織怎樣實施的指

30 See 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í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pp. 1052–1079; “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24.4 (October 1998), pp. 339–377.

示，更沒有發現縣一級黨組織關於如何執行這些指示的討論。中共內在的工作機制對我來說是不可見的，我也無從進行人類學意義上的參與式觀察。這裏一個關鍵性的障礙是，1989年我在陝西省檔案館所能讀到的，是陝甘寧邊區政府檔案，而不是中共的材料。與此相關的材料都保留在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只有最受信任的中國官方的歷史學者才能接觸到。在很多年裏，我的中國同行都告訴我，「等到老人們不在了」，檔案就會逐步開放。但我一直等到了21世紀，鄧小平那一代領導人相繼去世，卻發現檔案的開放程度非但沒有改進，反而變得更糟。2011年我重訪陝西省檔案館，發現二十年前還能看的檔案現在也不開放了。我從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退休的那段時間，研究冷戰史的資深歷史學家沈志華對我說：「老周，我們這一輩子，那些檔案都不會開放了，就用現有的材料去寫吧！」

這本書的問世就得益於沈志華明智的建議。現在就寫並且用手頭已有的材料寫——這個「指示」為我在書寫這段歷史時遇到的幾個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在對陝甘寧長年的研究中，我一直有意避開延安。延安的早期革命運動算不上活躍，直到1936年西安事變之後，中共才進入這座城市。在戰爭年代，主政延安的是外來者：中共中央、從南方來的紅軍老兵、從沿海城市投奔而來的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延安是另一個世界，需要另外討論，在聚焦於陝甘寧邊區成立的過程時，我沒將太多筆墨花在這上面。再者，陝甘寧邊區的建立就已經是一個值得講述的複雜故事了，其間充滿各種戲劇性的插曲：盲目的熱情、尖銳的衝突和代價高昂的勝利。絕大多數時候，游擊隊轉戰於陝北的山溝，僅能接收上級的口頭指令，因此相關文獻資料的匱乏與其說是因為當代黨政官僚機構的政治審查，不如說是限於那一時期的客觀條件。還有一層原因，本書所描述的事件大部分發生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抵達陝北之前，對相關文件的政治審查可能沒那麼嚴格，因而我有理由認為現存文獻能真實地反映當時中共各級組織之間的交流情況。最後，

我們在下文將會看到，在毛澤東從一張報紙上獲知陝北蘇維埃的存在之前，他本想把紅軍帶到中蘇邊境，尋找一塊安全的落腳之地，在那裏休息整頓，並接受蘇聯同志的軍事援助。如果他的這番設想變為現實，中國革命就會走上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陝北這塊相對安全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創生和存續，對我們所知的這場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至關重要。

陝甘寧邊區遠離西方影響之下的沿海地區，大多數農民是自耕農。它的存在證明：黨那套慣用的革命史敘述——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反帝反封——更宜視作宣傳鼓動的話語，而不是歷史分析的理論框架。落後的交通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市場的滲透基本上沒有威脅到農民「道義經濟」的存續。作為中國最落後的地區之一，陝北肯定沒有「由期望值上升所引起的革命」，頻仍的自然災害加之19世紀晚期的回亂，使得陝北人口稀少，革命的人口統計學模型在這裏並不適用。³¹ 而另一個極其簡單、但相當重要的社會學模型卻適用於陝北，即政權薄弱的地區為土匪提供了機遇，使其有可能發展成對國家權威的系統性挑戰。³² 這一議論也適於所有的中共根據地，因為它們都位於幾省交界的山區。不過，最終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陝北革命的還不是那些一般性的社會學模型，而是對

31 關於「期望值革命」，見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James Chowning Davies, *When Men Revolt and Why: A Reader i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關於此理論還可參見同書所援引的托克維爾的主張，他是第一個提出相關看法的人。人口統計學模型參見Jack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32 James Tong, *Disorder under Heaven: Collective Violence in the Ming Dynas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2–159.

該地區社會、經濟、政治、軍事力量此消彼長的複雜變化進行把握的歷史學的方法。

讀研期間，我曾在一門研討課上主持介紹馬克·布洛赫 (Marc Bloch) 的《法國農村史》。這本書建議讀者到鄉野間漫步以了解中世紀耕作方式，我質疑了它對我們這些當時被禁止進入中國的研究生有甚麼意義，這讓授課教授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不大高興。在推動中國向美國研究者開放方面，他是先驅。承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支持，我第一次獲得了在中國進行研究的機會，那個關於義和團的研究項目使我初嘗在農村進行田野調查的滋味。坦白講，對我來說，在中國鄉村徒步旅行、和老鄉聊天比任何其他歷史研究更有意思。為做實地研究，從1989年開始，我去過十幾次陝北，有時是幾天的緊湊行程，有時待一個多月。1989年我初到陝北，一批革命的親歷者還健在，不少人仍然住在只能徒步抵達的山村。我跟他們坐在烟熏火燎的昏暗窯洞裏聊天，當地助手幫我突破了方言的障礙，這些老農告訴我不少事情，令我耳目一新。儘管數十年的「憶苦思甜」重塑了他們的記憶，但他們已經老到可以忽略在場的當地幹部——對某些事件，幹部常常試圖提供在政治上更為正確的敘事。雖然老兵們可能會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打過的仗中有哪些神乎其神的故事，我依然相信：以正確的方法收集口述材料——邀請農民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並謹守事實——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³³

33 其他一些開展多年的研究項目也在鄉村進行了不少訪談，有助於獲得關於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重要洞見。Edward Friedman,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聚焦河北的一個有代表性的村莊。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對毛時代陝西中部和南部的女性幹部的記憶所做的分析格外精妙。

上述訪談以及數十年來對陝北地理環境的熟悉無疑使本書受益良多。不過，本書的核心敘事建立在當代檔案史料的基礎上。近些年，中共黨史學者收集和出版了一大批史料集——包括黨的報告、指示、決議、往來電文、信件等，其中大部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版，供「內部使用」，但這些年來，這批材料已經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公開獲取。中國的各級政府機構都有黨史辦，其職責是為黨在各個時期所作的決議提供文獻證據。對於本書的研究尤為重要的是在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通過批判1920年代的「右傾機會主義」、1930年代王明等蘇聯人訓練出來的國際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賦予毛澤東路線一貫正確的地位。³⁴ 儘管上述史料集的政治目的相當明確，但一般認為其中的文件是真實的，專業歷史學家已廣泛採用。此外，陝西和甘肅的省一級及地方一級的黨史辦都曾經編過史料集，不同機構的史料集所收文件不盡相同，在材料的取捨上體現了一些差異。如同其他許多方面的情形一樣，黨在闡釋自身的歷史這件事上，看來也並不是只有一個聲音。

黨中央也時而向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提交報告。俄羅斯檔案館所藏的這部分檔案很多已出版並被翻譯成他國文字。這部分材料通常具體、準確得多，可見各國黨支部不會在其共產國際上級面前遮遮掩掩。1989年的時候，我一度能在西安讀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檔案，這批材料極有價值，原汁原味地記錄了針對邊區最初幾年所面臨問題的坦率討論。在田野調查中，我常有機會閱讀和抄錄

34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上冊，頁1179–1200；英譯見 Tony Saich and Benjamin Yang,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1164–1179.

一些地方檔案。台灣國史館和調查局檔案也提供了一些出自國民政府視角的重要材料。最後，中國和美國的圖書館收藏的一批在國民黨佔領區出版的報刊（很多來自西安），也提供了陝西省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方面的有用信息。

不用說，這些材料並不能被視作對事實毫無矯飾的陳述。任何歷史文獻都是在某一特殊時刻由懷抱特殊目的的人以特殊的視角記錄下來的。地方黨組織在對主流路線表忠心時，在坦白一些小小的不足時，在為本地區不甚理想的革命形勢尋找各種理由時，其文件會愈加不透明。研究者必須在翻閱數千頁關於蘇聯五年計劃勝利如何鼓舞士氣、造成革命形勢高漲之類的黨內八股之後，才會發現，1930年代初，西安黨支部只有十幾個共產黨員。不過，要勾勒黨組織的規模、構成、分佈的話，這些材料仍是最佳信源。如果想對黨的那些變幻不定的政策及重大革命舉措按時間順序進行梳理，這些材料不可或缺；它們也揭示了地方黨按照中央部署在對特定階層和群體進行動員時面臨哪些具體的挑戰。

然而，在一些問題上，官方的黨史文件必須輔以親歷者的回憶錄。公開出版的文件往往美化並掩蓋黨內分歧，且出於安全的考慮常避免對個人指名道姓（除非此人已變節），以防交通員暴露和被捕。本書要講述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圍繞黨內一系列重要分歧，因此回憶錄材料必不可少，以幫助我們認清某場爭論的本質以及爭論各方所持立場。當然，任何回憶錄都包含作者本人的獨特訴求，因此必須以審慎、懷疑的眼光細讀，還要考慮到當代中國出版的回憶錄包含的一些特有的問題。其中之一是，領導人的回憶錄必須經官方審查，據稱是為了保守國家機密，實際上是為了使回憶錄與黨史的官方決議保持一致。其後果之一是使我們慣行的利用多種信源確定一樁事實的辦法有失效之虞：回憶錄呈現的也許只是所有歷史書寫都要遵從的官方立場。並且，有一整套相當可觀的激勵機制引導回憶者與官方敘事保持一致：這不僅涉及回憶者本

人的歷史評價，也與其身份和一系列特權掛鉤，從住房、醫療到子孫的就業機會，無所不包。³⁵

儘管如此，在檔案記錄非常欠缺的情況下，只能由回憶錄來補充。總體而言，我認為早年的回憶錄可信度最高，時間越久，記憶越不清晰，且會被官方歷史敘事掩蓋其本來面目。以此為原則，我很快就注意到一套特別的親歷者回憶錄，即1942年高幹會議以及1945年的西北革命歷史座談會上的發言。這批1940年代的材料是我所能搜集到的對兩次會議最早的記錄，但它們產生於整風運動這一非常語境之下，而且主持會議的高崗又抱着特殊目的——報復那些曾經在1935年肅反中整過他的人。我們將會看到，陝北黨分為兩派，積怨已久，在1942年及1945年的「七大」期間，爭論相當尖銳。如同後來出版的回憶錄一樣，當時各方的發言充滿自我辯護和向對手算的舊賬，爭議各方都可以發言，相當鮮活，我使用的一些材料甚至記錄了與會者在會場上的插話。最後，1945年的座談會緊跟着「七大」之後召開，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對1942年高幹會議的平衡。在那次會議上，高崗飽受批評，因為他提名的七位中央委員候選人都是與他同一派系的。³⁶ 這些跡象表明，陝北對於高崗鐵腕政策的不滿很可能是將他調至東北、改由行事溫和的習仲勳主政西北局的原因之一。基於上述因素，我認

35 在黨史研究領域，關於檔案與回憶錄所呈現的中國共產黨成立過程有着怎樣的不同的，如下著作提供了最好的範例：以檔案資料為主的 Hans J. Van de Ven, *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和以回憶錄為主的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又見 Ishikawa Yoshihir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 Joshua Fog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6 尤其參見1945年7月會議上李仲英和其他17人簡短的總結性批評。

為（一如既往，謹慎地認為），雖然整風運動在黨內生活的諸多方面統一了思想，但1942年和1945年形成的關於陝北革命的敘事對於我們理解革命的過程仍深具意義。

本書將大體按時間線索梳理陝甘寧邊區的建立過程。第一章介紹社會經濟背景：陝北貧瘠、匱乏、偏遠的地理條件，晚明流民叛亂以及19世紀中期的回亂讓此地幾經劫掠。其結果是到20世紀這一地區仍如死水一般：人口稀少，村子小，延安府以西一帶地方家族勢力薄弱，不過與此同時，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在東北部的無定河畔逐漸發展起來。第二章講述中共早期的歷史：黨的組織在陝西東北地區（榆林、米脂、綏德）的學校建立起來，由於左傾軍閥馮玉祥支持國共合作，黨也蓄積了力量。那時馮玉祥剛從蘇聯回國，帶回了蘇聯武器和顧問，共產黨員參加馮的軍隊，學生們則在學校周邊的村子裏組織農民協會。這一切在1927年戛然而止，蔣介石與共產黨分道揚鑣，馮玉祥很快追隨蔣，但不像蔣介石在上海那樣發動血腥清洗，只把共產黨人禮送出境。因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在中國西北軍隊的記憶裏還是美好的。

1930年代初，陝北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兩副面孔：北方是由土匪和民團組成的游擊隊；在較為富裕的渭河流域的關中地區，布爾什維克們試圖建立一個城市基地。第三章介紹了兩位主要的游擊隊領導人：西部陝甘交界處的劉志丹和陝西東部安定一帶的謝子長。兩人既競爭又合作。陝西黨的那些洋派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命劉的游擊隊向南方轉移，造成了軍事上的慘敗。緊接着，省一級黨的領導人被捕、叛變，陝西的革命運動陷入新一輪低潮。省委的潰散將游擊隊從黨的教條主義領導下解放出來，由此帶來我們在第四章將看到的陝北蘇維埃顯著發展壯大。劉志丹在孤立無援之中找到新的盟友，重建游擊隊，而謝子長則返回東部，在鄉村學校中發展黨的組織。1934年謝受傷並在次年年初去世，他所創建的黨組織在劉志丹的領導下與劉的軍事力量合二為一。這支隊伍在一連串前所未有的

軍事勝利中攻破了六個縣城。不過，軍事上的勝利卻使劉志丹和他手下的重要幹將成為被逮捕和清洗的對象。鄂豫皖蘇區的徐海東率部從湖北來到陝北，劉志丹在黨內的批評者因徐的加入獲得了新的力量。毛澤東和黨中央從江西抵達陝北後，劉才被解救出來。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自己那支紅軍隊伍向中蘇邊境預定的安全休整地區行軍時，讀到劉志丹在陝北建立了根據地的消息，遂轉道陝北。第五章描述了毛澤東為擺脫陝北的貧困所做的絕地求生般的種種嘗試，以及如何努力尋找新的盟友、抵抗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這是在貫徹共產國際建立新統一戰線的政策。打通山西的軍事嘗試失敗了，其結果是劉志丹及其麾下幾員重要指揮官陣亡，陝北失去了最有實際力量的領導人；另一個取道寧夏、穿越戈壁灘抵達蘇聯邊境的軍事計劃也夭折了。不過，黨招徠盟友的種種嘗試終成正果：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在西安事變中聯合綁架了蔣介石，逼蔣建立抗日統一戰線。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之時，中共在陝北的根據地已縮小至陝甘交界處幾個窮縣的規模。第六章描述了這個小根據地擴展成陝甘寧邊區的過程。因西安事變，黨中央移駐延安，蔣介石開始給紅軍提供不多的軍餉。異常艱苦的統一戰線談判一直持續到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伴隨國共兩黨政治和軍事摩擦的升級，蔣介石的軍隊攫取了甘肅境內很大一塊地盤，中共的對應策略則是調回山西的軍隊，佔取了陝西東部較為富庶的綏德地區。至此，邊區的四至基本確定下來。直到此時，陝甘寧才真正成為一個安全的根據地。在地盤交換的過程中，綏德、米脂一帶轉到了共產黨轄下，那裏有一批力量不小的地主和鄉紳，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時為應付他們的影響，中共有必要發展出一套新政策，這套政策後來也推廣到中國其他地方。

在中國，革命史有特殊的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其革命起源之上。毛澤東的肖像高懸在天安門城樓上，

天安門廣場一側的國家博物館內有名為「復興之路」的歌頌革命的大型展覽。近些年，中共也加強了政權對革命的認同。中國並不是唯一對革命過往念念不忘的國家。法國大革命的記憶在當代法國仍然相當重要，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至今是法國政治文化的中心。美國人對7月4日和《獨立宣言》的紀念延續至今，美國國父們對公共話語的影響也從未隱退，儘管他們在幾個世紀之前起草的憲法有不少落後於時代的條款，但它在政治光譜中始終保有合法性。在歷史上諸多偉大革命中，只有蘇俄革命已經失去神聖的地位，不過列寧墓仍留在紅場之上。

中國革命情結的獨特之處在於這個國家對革命意識形態的長期抱持。中國的第一場革命發生在1911年，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宣告中華民國的誕生。民初軍閥帶來的混戰與迷惘呼喚着一個新的開始，孫中山乘勢而起，在蘇聯的幫助下，重組國民黨並發動了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在蔣介石接過孫中山的權力、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之後，放棄了孫的聯俄容共政策，但並未放棄其革命抱負：他將共產黨斥為「反革命」。此後至少到六七十年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人對於革命的執着一直是這個國家最核心的政治文化。³⁷

要理解這一過程，重溫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經典文章〈以政治為志業〉和〈以科學為志業〉不無教益。儘管我不願將歷史稱作科學，但我百分百認同韋伯的訓誡：學者應將「事實」從「價值」

37 關於現代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革命，尤其參見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04–141；Elizabeth J. Perry, *Anyuan: Mining China's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中分離出來，學者必須直面事實，哪怕是「令人不安的事實」。³⁸ 歷史學家的使命是發現過去發生了甚麼，以及何以發生。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無疑戰勝了武器更精良、也更具經濟實力的宿敵，但這一事實本身並不能等於說「革命」得到了廣泛的群眾支持，也不能說明「解放」的形而上邏輯。在其學養深厚的著作《歷史學家的謬誤》中，大衛·哈克特·菲什爾(David Hackett Fischer)對「恆等式謬誤」(fallacy of identity)大加撻伐，所謂「恆等式謬誤」即認為重大事件一定有重大的起因。³⁹ 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重大如中國革命這樣的歷史事件，也必須將其視作一系列偶然事件因緣機會的長期過程。地區、國內和國際環境為其提供了關鍵背景，地方及區域內的社會構造形塑和限制着人們的行為；與此同時，個人與集體的能動性和政治選擇對一些特定事件的走向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一系列事件累積的效應構成了所謂革命的過程。總而言之，歷史學家信奉的那句古老的格言是有道理的：上帝存在於細節之中。中國也有類似的成語，即老子所謂「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38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and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77–156, 引文來自 pp. 145–147.

39 David Hackett Fischer,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0), p. 177.